

发展的潜力

—— 体制 结构 就业

国风 著

红旗出版社

发展的潜力

——体制 结构 就业

国 风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展的潜力：体制·结构·就业/国风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9

ISBN 7-5051-0876-X

I. 发…

II. 国…

III. 农村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F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7337 号

发展的潜力

——体制 结构 就业

国风 著

责任编辑：董邦俊 封面设计：李惠民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h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64071348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廊坊市百花印刷有限公司

2003年9月北京第1版 2003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8175 字数：197千

ISBN 7-5051-0876-X/D·384

定价：16.50元

序 论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政策手段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这种增长还能持续多久，潜力究竟有多大？潜力究竟在哪里？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应该是消费的潜力所在，城市的内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础公共设施建设，二是居民生活消费，但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和发展，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具相当水平，有的已经和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城市居民的物质消费水平也达到很高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达到饱和程度。居民消费品主要包括：一是食品，现在农产品极大丰富，价格低廉，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很低，低于中等发达国家；二是日常耐用消费品，主要有住房、电器、汽车等，城市居民由于享受公共福利，这些方面的支出也已有限。因此，扩大内需仅靠城市潜力是有限的。

除了城市，自然就会想到农村了，那么农村的情况如何呢？农村居住着中国 70% 的人口，这部分人口的消费水平如何，不能不说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内需的扩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农村的基础设施来看，虽然这些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起点太低，目前决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条件，如乡村道路，农村供电供水等设施还很落后，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就更落后，与城市的差距更大。从农民的生活水平来看，整体上说，刚刚基本解决温饱，开始进入小康，农民人均纯收入才达到 2000 多元，现金收入就更低了。而且农村的发展很

不平衡，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不平衡。现在，在城里电视机、电冰箱等都已达到了饱和程度，但在农村，远的不说，走出北京100多公里，有的农民家里用的还是12吋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还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电冰箱就更少了。我们所说的潜力，就是指农村目前的消费水平还很低。试想，如果每户农民家里都买一台20吋的彩电，全国的GDP就会增加多少？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设想，但说明了一定的道理。

当然，这个问题的发现，或者说提出，只是给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希望要变成现实，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关键是我们如何挖掘出这个潜力，能不能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使农村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问题的提出往往是在解决问题的条件同时具备时才成为可能。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必须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进行调整。这两年，中央作出的关于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关于西部大开发，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关于加快小城镇发展等重大决策，就是这一思路的政策体现。这些重大决策，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加快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因为农村对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就在于农村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而农村市场的潜力，就在于目前农民消费水平低。农民是农村市场的主体，要使农村潜在的市场变成真正的市场，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上去了，购买力提高了，消费能力增强了，才能拉动工业品的生产，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必须看到，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市场的开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经济资源的投入和开发，而且需要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而就其根本来看，体制的改革显得更为重要。众所周知，农村的第一次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我国实现了由农产品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

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吃饱穿暖这个中国人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理想，使我国人民总体上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农村全面实现小康，根本还得靠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看到，农村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还有许多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地方，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计划经济式的粮食流通体制等等，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村要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打破束缚农民的各种制度枷锁，需要建立调动农民首创精神的激励机制，因此，进一步解决农村生产力的出路还在改革。

农村的第二次改革与第一次改革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第一次改革，主要特征是拨乱反正，解放生产力；那么，第二次改革的主要特征则是体制创新，发展生产力。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改变目前城乡分割，双轨运行，真正给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相信通过这次改革，一定会激发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调动他们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村生产力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样，农村这个潜在的市场才会真正变成一个广阔的大市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奇迹。

《发展的潜力》将对以上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作者
2003年春

目 录

序 论	(1)
第一章 关于发展的理论	(1)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1)
第二节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13)
第三节 贫富差距与经济增长	(22)
第二章 农村发展状况分析	(31)
第一节 农村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第二节 农村发展的潜力所在	(37)
第三章 体制潜力	(51)
第一节 改变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	(51)
第二节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60)
第三节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85)
第四节 对农民补贴方式改革	(122)
第五节 农村金融改革	(132)
第四章 结构潜力	(144)
第一节 调整分配格局	(144)

第二节	调整农业结构·····	(162)
第三节	加强农村医疗·····	(177)
第五章	就业潜力·····	(185)
第一节	农民就业问题·····	(185)
第二节	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207)
第三节	积极发展中小城镇·····	(237)

第一章 关于发展的理论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自从 1978 年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维持了 2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长，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赖于对中国经济运行的认识，特别是依赖于对过去 20 年生产率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之作用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下面首先提供一个分析框架，然后分析过去中国生产率增长的情况及其未来变动趋势，最后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分析框架：扩展的索罗核算方法

（一）分析方法的文献渊源

分析的方法有两个文献渊源。一个是索罗 1957 年提出的关于增长核算的分析框架，一个是法雷尔等人提出的关于技术效率的测量方法。

索罗的分析框架按照下面的关系式，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

$$\dot{y} = \dot{A} + \sum_i (\alpha_i \cdot \dot{F}_i)$$

上面的式子中, y 代表产出的增长率, F_i 代表各种生产要素的增长率, α_i 代表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在产出中占有的份额^①。 A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通常赋予该项的经济含义是技术进步。

但是, 事实上, A 所测度的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按照近来的文献进展, A 可以被进一步分解为两个部分: (1) 生产函数本身的位移, 即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进步; (2) 技术效率变化导致的产出变化效应。为了说明第二方面的效应, 首先需要说明技术效率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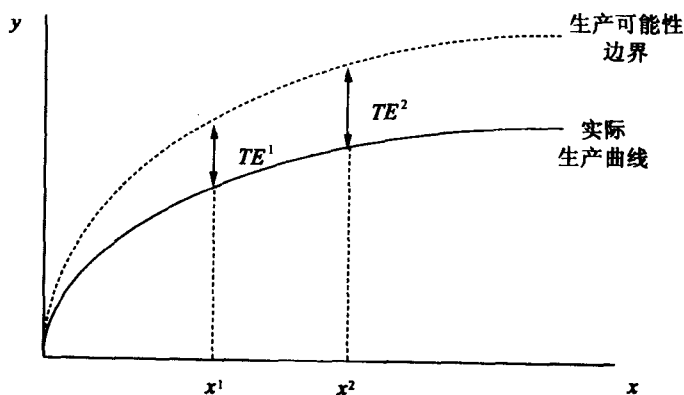


图1 技术效率的含义

众所周知, 生产函数代表的是一个行业在最好的硬件和管理技术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 而许多经济主体在给定投入之下的实际产出水平往往小于潜在产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水平之间

^① 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中性的条件下, 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的份额之和, 恰好等于1。也就是说, 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将总产出分割净尽。

的差距，就是技术效率。图 1 直观地显示了单一要素投入的情况下技术效率的含义。图 1 中的 x 轴代表要素投入量， y 轴代表产出量。 TE^1 和 TE^2 代表投入水平为 x^1 和 x^2 之下的技术效率。

运用法雷尔等人的方法可以将索罗框架中的 A 分解为反映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两个部分，从而深化了生产率 and 经济增长的分析。

对中国而言，经济改革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理论上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像中国这样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际产出远低于潜在的最高水平。经济改革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提高产出水平，使之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即提高技术效率）。另一条途径是促进创新，即技术进步。考察中国生产率的变化，特别是考察生产率两个构成部分的变化，对认识过去 20 年中国经济惊人增长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增长前景，大有裨益。为此，这里把这种方法和索罗的方法结合起来，扩展传统的索罗方法，构造新的用来分析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二）方法及其特点

这里使用的基本生产函数形式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涉及到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设定包含了这样几个假定：（1）生产规模报酬不变；（2）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因时而变，生产函数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3）各个时期技术进步速度存在差别，这个假定比各个时期技术进步速度不存在差别的假定更加符合现实；（4）技术效率因时而变，也考虑了不同地区变化速率不一样的情况。

根据索罗的增长核算方法，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生产率的增长分解则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前者归因于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后者归因于生产可

能性边界本身的移动。即使没有技术进步,落后国家或地区通过缩小其产出与最佳产出的差距(即提高效率)也可以获得生产率的正增长。

不难理解,常规的核算方法难以区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所产生的效应。而前者是创新或采用最发达国家或经济之新技术的结果,后者主要是效率提高(逼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结果。正如尼雪米朱(Nishimizu)和佩奇所认为的那样,这两者具有相当不同的政策涵义。这种分解从量上区别了经济改革对长期增长所产生的“水平”和“增长”效应。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水平效应导致了实际产出的增长(即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另一方面,增长效应意味着经济改革不仅提高了短期的产出水平,而且促进了技术进步,因而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两者的根本差别是,水平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增长效应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维持或增大。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上述用于分析1981~1997年27个省区的分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1985~1997年的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系列,1981~1984年的数据通过外推法获得。为了将名义的GDP数据平减为不变价格的GDP,采用的价格平减指数是由名义GDP和GDP实际增长率计算而来的。由于缺乏劳动“人时”数据,这里采用全部就业人口这一数据。

每年的净资本存量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得来。1952~1997年各地区的年度投资数据均可获得。除了年度投资流量数据之外,估算资本存量还需要另外两个参数:初始时刻资本存量和资本折旧率。我们采用美国经济学家提供的1953年资本存量增长率(20.83%)和1953年的资本增量值计算结果,估算1952年中国的资本存量为952亿元。在现有的文献中,折旧率的选择通常比

较随意。为正确选择折旧率，本文尝试了4%、7%和10%三种可能，并采用适当的计量方法进行检验，最后确定采用7%的折旧率。

在1982~1997年的16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年均10.4%的增长。同时，就业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递减。而资本在这时期保持了年均11.6%的稳定增长。由图2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16年中，GDP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逐步靠近。这也许表明，资本投入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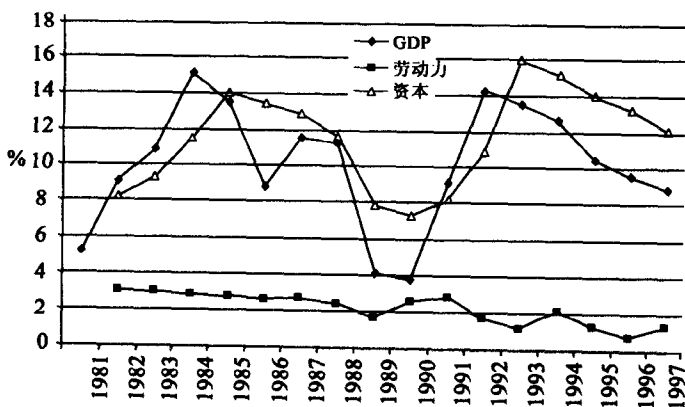


图2 GDP、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增长 (1982~1997)

三、估计结果及其解释

计算结果表明，改革以来存在着技术进步，且随着改革的深化，技术进步在加速。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见表1。表1中三列数据之间的关系是，生产率提高等于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进步之和。这三列的代数值越大，分别说明技术效率提高幅度越大、技术进步越快、生产率提高步伐越快。

表 1 中国技术进步率、效率变化率和生产率增长的估计

年份	技术效率变化	技术进步	生产率提高
1982	0.39	1.23	1.62
1983	0.79	1.24	2.03
1984	2.17	1.25	3.42
1985	1.07	1.25	2.33
1986	-1.13	1.26	0.13
1987	-0.35	1.26	0.91
1988	0.79	1.26	2.06
1989	-1.25	1.28	0.03
1990	-0.40	1.29	0.89
1991	-2.74	1.3	-1.44
1992	1.9	1.3	3.2
1993	1	1.3	2.3
1994	0.42	1.3	1.72
1995	0.64	1.3	1.94
1996	-1.53	1.3	-0.22
1997	0.27	1.31	1.58
若干时期的平均水平			
1982 ~ 1985	1.11	1.24	2.35
1986 ~ 1991	-0.84	1.27	0.43
1992 ~ 1997	0.45	1.3	1.75
1982 ~ 1997	0.13	1.28	1.41

观察技术进步的趋势,可以看出,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定增长。在 1982~1997 年的整个时期,三个指标的平均值均为正,且技术进步起主导作用。因此,根据这一研究,可以得出“技术进步对过去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的结论。另外,表 1 清楚地表明,三个指标的变动可以分三个时期考察,即 80 年代前期(1982~1985),80 年代后期、90 年代初期(1986~1991)和 90 年代(1992~1997)。为表达方便起见,三个时期之三个指标的平均值列于表 1 的下半部分。

表 1 清楚地显示,80 年代早期即改革初期,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最好,效率和技术进步均表现出正的增长。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确实带来了明显的效率改进,也就是带来了明显的“水平效应”。中国的改革于 70 年代末始于农业部门,农村改革的成功已被文献充分证明。经济改革通过几种途径影响效率改进。第一,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引入的改革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旧体制下被抑制的增长潜力。第二,改革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外出打工成为可能,这带来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根据世界银行 1997 年所做的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中国整体增长率提高了 1 个百分点。

然而,由表 1 可见,80 年代后半期和 90 年代初,中国的生产率出现了明显下降的局面。1986~1991 年间,除 1988 年外,效率年年下降。结果导致了这一时期技术效率变化平均为负值的局面,并使之成为 1981~1997 年绩效最差的阶段。效率的下降可能发生在经济的所有部门。一些经济学家还深入分析了这一时期农业部门的效率下降,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效率严重下滑的原因很多,包括:

第一,农业效率的下降对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下降的原因有多个,如政府和农民对土地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农产品对工业品的贸易条件恶化等。第二,在 80 年代

中期，中国进行了城市和企业的一系列改革试点。与农业改革不同，这些改革，包括价格改革、分权化和工业改革等，要复杂得多，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三，80年代中期的改革遇到了1985年开始进行的治理整顿。结果，国有企业受到了冻结信贷的严重影响。与此同时，许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开始兴起，且其中的大多数进入了其资源价格被国家严格控制的部门。这些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也受到了治理整顿的严重影响。第四，80年代中期引入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工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这种制度鼓励了寻租行为，并因此而损害了经济增长。那个时候的分权化也为寻租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所有这些都对经济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经济效率在90年代早期得到了恢复。三个指标均呈现了上升的态势。产生这种态势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中期采取的改革措施可能产生了显著的政策效应。特别是价格放开的改革在90年代早期几乎彻底完成。价格扭曲的消除为中外投资者提供了较好的商业环境。第二，90年代早期，引入了更多的综合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导致了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第三，工业改革使国有企业的分流职工得到重新配置。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国有企业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半个百分点。

最后，从表1可以看出，1982~1997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41%。这一增长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既产生了“水平效应”，又产生了“增长效应”。这一发现可以用来支持中国经济可以在长期内持续增长的判断。然而，表1还显示，效率的明显下降分别与1985、1989、1992和1995年政府所进行的治理整顿有关。紧缩政策下的信贷冻结是效率下降2~3年的部分原因。惟一的例外是1995年的调整只引起了

1996年效率的暂时下降。这归因于由多重因素（如农业的良好收成，经济结构的改善，逐步趋紧的经济政策，诸如利率、汇率等更有效政策手段的应用）促成的“软着陆”。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它反映了依赖于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政策手段的宏观经济管理成本。

四、各种源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基于上述得到的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将中国GDP增长当中各种源泉贡献的百分比测算出来。具体来说，可以把中国的GDP增长分解为4个部分，即劳动投入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效率变化的贡献和技术进步的贡献。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归因于资本积累，其贡献平均超过了50%。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平均达13.5%。这一贡献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对80年代早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而对90年代经济增长的贡献属于适中水平。可以看出，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与其他研究比较，这里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要小得多。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有二。其一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即份额系数）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不同的后果。比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赋予增长快的生产要素较高的份额系数，则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相对较低。大量的研究在份额系数的选定方面，具有相当的主观性，而本文研究的份额系数则是严格计量估计的结果。

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方法论差别。传统的核算方法将产出增长中要素投入贡献剔除之后的所有残差部分，统统归因于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与这些研究相比，本文研究的特点一方面在于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两种效应；另一方面在于，不将残差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当